

拓宽人口学研究领域的新尝试

——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国际(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综述

陶 乘

中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辐射功能对东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到人口的发展,她又起到什么作用呢?1991年新年伊始(1月5~7日),来自美国、法国、葡萄牙、日本、中国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50余名专家学者,聚首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澳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次题为“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的国际(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中外社会文化交流协会、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东亚大学共同主办。会议得到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博士、澳门娱乐有限公司何鸿燊博士及澳门市政厅、海岛市政厅、皇冠保险公司等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

1月5日,研讨会举行开幕式,会议秘书长、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副会长魏美昌主持,会议主席、中国政协常委兼经济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罗涵先教授致开幕词。他指出:“在影响人口发展的所有因素中,有一个人们注意较少的方面,那就是文化的因素。我们这次会议以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为题来探讨人口问题,就是为了拓展我们的视野,把注意力转到更深层的因素上来探索”。

大会副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教授、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博士、澳门文化司署马若龙司长、东亚大学校长薛寿生博士、澳门政府过渡期政务司林慕士司长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他们认为,这次研讨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很适宜,它对于人口学的研究,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将起到推动作用。

开幕式之后,代表们进行了3天的专题发言、讨论。各地学者报告了自己从文化角度对人口问题所作探讨的最新成果。整个会议学术气氛浓厚,发言踊跃。代表们普遍感到这是一次互通信息、扩大视野、启发思维的研讨会。

1月7日下午,会议举行闭幕式,会议副主席田雪原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开拓了领域,开出了水平,开创了新路。会议副主席、澳门东亚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副主任、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理事会监事长黄汉强教授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有意义的、有成果的会议”,“会议从学术角度探讨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的关系,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有开创性的”。

会议共收到论文28篇。下面将会议探讨的主要问题作一概述。

一、文化与人口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化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口的发展变化同样也受到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是影响人口发展诸种因素的重要方面。与会者普遍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的终极原因是经济问题,而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也会产生作用。文化与人口的联系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包括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多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深刻。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实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学者指出:人们的各种行为是受他所在社会的观念、意识支配的,这种观念、意识就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具体到人们对生育、迁移、职业选择等行为的态度,更是无时不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并进而对人口的发展产生作用。

(二)文化是人口质量的内在要素。有的学者对此作了分析,认为文化所体现的人口质量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1)文化是人口思想道德素质的核心;(2)文化影响人口的身体素质,无论体型审美观,还是营养文化,或者医疗卫生,都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3)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知识的积累,人口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最直接的文化,它构成人口质量的基本要素。

(三)文化现象的滞后性特征使它对人口发展的作用得以显示出来。与会者认为,我们所探讨的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它通过社会的习俗、礼节、道德、宗教、制度等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传统性。有的学者对此指出,人口的发展变化固然要受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这种发展要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体现出来。而人的行为要受他所在时代各种社会规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的许多方面具有时代滞后性。即一个时代经济发展了,那些看起来与新的社会不相适应的文化内容还要以原有的形式保持下来并产生作用。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与会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文化与人口发展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因而很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去探讨,找出其积极的方面,剔除消极的内容,以便为人口实际工作服务。一些代表指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要防止这种倾向,即把人口问题均归结于文化的优劣,而忽视经济等根本性的因素。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也成为这次会议上学者们谈论最多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口持续不断产生影响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与会者感受很深,那么,她为什么发挥如此长久的作用呢?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的农耕经济是传统文化得以维系的基础。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既是传统文化得以产生并不断维系的基础,也是她能够广泛发挥作用的原因。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少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传统文化也在持续不断地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产生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影响的几个方面。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最为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1. 传统文化对生育观的影响。它涉及到生育子女的数量、性别的偏好等内容,具体来讲,(1)早婚多生、多育,成为普遍的社会信条。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思想家、还是政治家均把“民庶”视为贤明社会、强盛国家的重要标志。为此,许多王朝的统治者制订鼓励早婚、奖励生育的政策。一些

学者指出,这种人口行为的产生也和当时社会医疗条件差、人口死亡率高有关,只有早生、多生,才能弥补、抵消过高的死亡率。(2)“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多子多福”成为浓重的社会习俗。这些观念在历代思想家的著作、言论中均被提及。一些学者指出:在汉武帝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被作为统治理论。儒家最重“孝”道,以“孝”为“仁之本”。“孝”的内容很多,但自从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有大”这句话以后,没有子嗣成为最大的不“孝”。子孙的“孝”又体现在对父母的赡养上,传统社会没有社会保险制度,年老父母主要靠子女,特别是儿子赡养、照料。因而儿子越多,保险系数越大,即所谓“多子多福”。这些观念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还有的学者指出:传宗接代思想和对男孩的强烈偏好的形成,有其深远和复杂的社会根源。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从一个国家亦即从宏观上看,男性人口是一国的劳动力的主要源泉,也就是劳役、兵役、税收的主要来源,它同土地一样,是财富的来源。因此中国历代政权一贯鼓励人民多生育男孩,以增强国力。从一个家庭亦即从微观来看,一个家庭(家族)的生命的延续,固然首先是直系血缘关系的延续,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关键在于它的财产继承权的延续,在“父产子袭”的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及其继承权的延续,必然由男性后嗣;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后嗣,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必将结束。

2. 传统文化中存在重士农、轻工商的职业观。一些学者指出,传统社会里统治者往往把农业人口的多少作为国家强盛的标志,采取以农立国的方针,把士作为统治的依靠力量(而国家对士的使用数量很有限)。把工商当作末业人口予以限制。因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农业劳动力比例过大也是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同时,传统社会中,官方、宗族、家庭、习俗都禁止百姓的流动行为,加强了社会的封闭性。由此降低了人口的身体素质,阻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促使生育率上升。

3. 传统文化渗透于各代政府所制订的各种人口政策之中,这使文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更加明显。一些学者指出,从先秦到近代,特别是两汉以来,历代政府以法令的形式将充满儒家思想色彩的人口政策向民众贯彻,从而对当时的人口行为起到很大的抑止或激励作用,特别是加重了许

多落后的人口意识。

上面观点主要对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负面作用进行了剖析。与此不同,有些学者则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人口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方面。

1. 传统文化在促使生育率下降方面产生的作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影响地区如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和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澳门及台湾,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生育率下降较快,远远快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下降也很快。这说明除了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因素外,中国文化还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它体现在,(1)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群体意识,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不同,集体、群体意识在客观上造成中华民族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传统,希望国家繁荣富强。因而人们能从大局考虑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精神,这成为发展现代经济的一种动力和优势。一些东方国家战后经济突飞猛进,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同这种精神文化不无关系,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使生育率下降。(3)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和道德修养,这些无论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降低生育率都有很大作用。(4)中国传统文化“重人轻天”的无神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宗教势力较弱,没有形成对控制人口的阻碍作用。

2. 中国的孝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有的学者指出,孝文化同中华民族在远古的生息、繁衍有联系,是和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同时发生的。其内容主要有五点:一是赡养父母,二是顺父母,三是敬父母,四是对父母的生活与疾病要精心奉侍,五是父母送终并依礼安葬。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养老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

3. 医学文化的积极作用。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绵延和人口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传统医学文化吸收了先秦诸子的“兼爱”、“仁”等观念,利用其经济、方便的医疗特点,为解除广大百姓的痛苦,降低死亡率,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不少学者强调,传统文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对其中消极的方面要努力创造条件消除,对优秀的内容要注意发扬。

学者们还指出,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在当代依然存在。因为在当代中国农耕经济

仍占相当比重,还有将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生育观念、职业观念、重男轻女观念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如何在中国这个经济不甚发达的社会中,减少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人口观念的影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当代文化与人口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化较之于传统文化是一种更复杂的文化。它包括的方面也比较多。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半个世纪来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加上改革开放后正在吸收的新文化形成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化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的杂糅。具体到人口方面来讲,中国的当代医学文化是由传统医学文化和近代西方医学文化以及苏联传入的医学文化而形成中西医结合的体制,即传统的儒家思想、近代的医德概念和现代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以及救死扶伤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医学实践教育,普及医疗及医疗预防网等措施来为广大人民服务。当代中国的人口观念也是由传统的内容和外来的东西的结合。这其中有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的观点,而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

有的学者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对人口变动的的影响很大,但难于作出量的估计,对于传统文化尤其如此。而在当代,作为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的狭义文化对生育率变动的作用,堪称亦步亦趋,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做出计量,从总体上观察,人口的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相反,文化程度越低,生育率越高。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文化对人口发展影响的面更广更大。因此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以加深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并筹措比较符合实际的解决对策。

四、关于人口与文化转变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她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积淀,并深刻影响到各个时间的社会,特别是人口的状况。文化既有生机勃勃的方面,也有落后的内容。如何建立一种贴近现实社会,并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文化,促进人口观念的转变,成为许多与会学者思考的问题。

1. 建立新的生育文化。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生育文化是指生育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下转第10页)

近于东欧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四)40年来,男女平均寿命都有很大提高,男性提高29.8岁,女性提高30.6岁,男女大体经历了一个同步提高的过程,但女性略快于男性,平均寿命的性别差异由40年代的2岁扩大到目前的3.2岁。预料这种逐渐扩大的趋势将继续下去。

(五)40年来,城乡平均寿命提高得都很快,可能由于乡村寿命水平点低,提高得多一点。城乡寿命水平差别在原有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发展过程,80年代

后期城乡差为3岁,已低于男女差,今后随着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寿命水平的差别也会继续逐渐缩小下去。

(六)现阶段,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均寿命差别较明显,1985~1988年汉族为69.7岁,少数民族仅有65.3岁,相差4.4岁,民族间的差别大于性别和城乡差,需进一步分析原因,采取必要的对策。(本文责任编辑 洪 映)

(作者工作单位:阎 瑞 大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陈胜利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

(上接第62页)

他们强调在中国现有社会条件下,实现生育文化转变是有可能的,不能消极等待经济发展后再去进行这项工作。也需指出,文化的转变依赖经济基础,但经济发展与生育文化并不是静态的。它们随时都在发生着微小的渐进的共进变化,将中国传统经济确定为不变的前提条件而把生育文化推向不可转变的绝对化,或脱离社会、经济制度的纯生育意识论的转化,都是不现实的。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当代生育文化转变的特征:(1)生育文化转变的艰巨性,(2)生育文化转变的反复性,(3)生育文化转变的灵敏性,(4)生育文化转变的多向性。并指出,当前中国生育文化转变的重心是以人口控制论为重心,同时以人口疏导论为导向,将增大劳动力数量投入转化为增大劳动力质量的投入,建立求质量的人口需求体系,疏导人们生育意识的转变。

2.以经济发展来带动人口意识的转变。有的学者指出,从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角度观察,应当全力推进由高生育率——低文化——低生产率向着低生育率——高文化——高生产率的转变。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以沿海开发地区为龙头的经济发展已开辟了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这些地区发生了有利于由孩子数量成本向孩子质量成本的转移,从根本上推动了“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这种状况尚未改变,因而在文化范畴尚有两大任务,一是继续大力破除旧的生育观,二是要努力发展教育,改变某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报酬不尽合理的状况,激发人们更多地投入孩子质量成本的积极性。

3.关于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发扬问题。(1)有的学者认为,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在各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孝文化,并具体指出,在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在调节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社会伦理关系时,在发展社区老年福利事业中,在家庭关系中,在老人法制建设方面等,都有必要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此,有的学者也提出不同意见,以为孝文化从历史上看带给社会更多的是负面影响,特别是这种思想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对人的行为产生束缚,解决当代人口问题不能引入这种观念。(2)关于医学文化。一些学者建议,应该充分利用医学文化在解决当代人口问题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研究及制定人口政策;研究及提出有效的优生、计划生育和避孕措施;提高全民的医学文化知识和公民意识水准,使之能够主动地参与和配合各项人口政策;研究及提高人口素质,参与医疗社会工作、主要是医务社会工作、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以及精神病理社会工作。

总之,这次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第一次集中从文化角度探讨人口问题,其中有的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有的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研究;有的方面与会者意见较一致,有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代表们普遍感到,这次研讨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通过人口学界和其它领域专家、学者的努力,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的研究一定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